学术 视点

红学史的百年历程

——“纪念新红学100周年、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40周年暨2021年学术年会”综述

本报记者 郭海瑾

7月29日至31日，“纪念新红学100周年、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40周年暨2021年学术年会”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红楼梦学会、天津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全国26个省市地区的160余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探讨。《红楼梦》及中国古典文化研究如何在新时代更好地展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果？专家学者们观点如何？本期学术家园版撰写综述予以报道。

本次会议还特设了《红楼梦》绘画艺术展，分别展出了：彭连熙的金陵十二钗人物画，贾万庆的大观园图，陈志伟、许军杰的红学人物十六幅，谭凤嬛的《红楼梦与张家湾》及红楼人物画，以及“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平儿的扮演者沈琳根据“87版”人物造型绘制的红楼人物油画。这些精美的艺术品也为本次大会增添了光彩和艺术气息。

百年新红学的发展历程

“新文化运动的许多突破口是从提倡通俗的白话文开始的，‘红学’从戏语演变为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北京曹雪芹学会创会会长胡德平在年会开幕致辞中指出。20世纪以来，学术界因《红楼梦》异常出色的艺术成就、深邃厚重的思想底蕴和包罗万象的文化含量而产生了以《红楼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红学。

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以实证主义和传统考据学相结合的科学方法研究《红楼梦》，抨击了索隐派的“旧红学”，开启了新的红学研究范式，成为“新红学”诞生的重要标志，《红楼梦》研究向自觉、自为阶段迈进。

“在新红学的创立过程中，胡适《红楼梦考证》作为第一篇学术论文，俞平伯《红楼梦辨》作为第一部学术著作，彼此前后相继，‘双璧’辉映，一同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新红学体系。”浙江工业大学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梅新林表示。

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红学研究成为主流。197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在原文化部《红楼梦》校订注释小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同年5月，《红楼梦学刊》编委会也在北京成立。1980年7月，中国红楼梦学会正式成立，成为红学事业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

说起这段红学发展史，与会专家和学者都深有感触。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韩子勇回顾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与新时期红学的紧密联系。他指出，40余年来，红楼梦研究所涌现出了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等红学大家，为新时期红学的开拓和繁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红楼梦研究所的学术成果中，新校本《红楼梦》、《红楼梦大辞典》等都经久不衰，至今仍有极大的影响力，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建院后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之一。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红楼梦学刊》是红学领域最权威的期刊，多次被评为核心期刊以及最受欢迎期刊。《红楼梦学刊》不仅是学术发表、交流的平台，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红学作者队伍，见证着新时期红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庆善说：“纵观百年红学史，新时期红学无疑是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红学成为当代‘显学’，正是新时期红学的重要成果。新时期红学打破了几十年的思想禁锢，打破了学术研究的禁区，使得《红楼梦》研究逐渐转入了正常的学术轨道。”

“由这样一部书，生出了一门学问，成立了一个学会。中国红学会是一个学术团体，以学会友、以学结合，它没有级别、不须考核，它聚合了各层面、各地域的红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尤其是联结了老中青几代人。”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吕启祥的心目中，中国红楼梦学会是一座桥梁、一个平台、一条纽带，与《红楼梦》结缘是一种幸运，由此结识了老一辈、同一辈和新一辈的学人至今已40多年。

中国红楼梦学会、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刊》成为研究《红楼梦》的最重要学术阵地，在凝集红学研究队伍、提供红学研究资源、促进红学传播等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领军与示范作用。

说不尽的《红楼梦》

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

“200多年来，《红楼梦》以其深邃的思想深度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千千万万的读者，造就了万万千千的‘红迷’。人们以各自角度，对这一文学奇迹进行解读诠释。”天津师范大学校长钟英华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一波波的‘红学热’，催生出累累硕果。”

打开百度搜索“红楼梦”，出现的词条有上亿条；打开知网主题搜索“红楼梦”，也有3万多篇的相关研究文章；关于这次会议，专家学者们提交的学术论文亦逾120篇。新红学百年与红学史论，《红楼梦》作者家世生平交游及文物研究，脂批、版本及成书研究，《红楼梦》文本、文学、文化、文献研究，《红楼梦》艺术改编、艺术创作研究，《红楼梦》与当代文化建设，《红楼梦》研究的方法论，域外红学与《红楼梦》传播、译介研究……这些涉及《红楼梦》的方方面面论题，都成为专家、学者们以及红学爱好者争相讨论的话题。

《红楼梦》，一部说不尽的古典名著。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孙伟科对《红楼梦》的笔法论进行了研究，在他看来，在古代小说研究中，“不写之写”是评点家在欣赏、分析《红楼梦》时对其客观存在的艺术手法的一种描述和概括。《红楼梦》是曹雪芹“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产物，是作家“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匠心之作，《红楼梦》写作叙事中包含着特殊的笔法。“不写之写”是《红楼梦》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红楼梦》的重要艺术特色之一。

鲁迅文学院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王彬在提交的论文中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所居住的地方进行了研究，他指出，曹雪芹曾长期在北京西山居住，殚精竭虑创作《红楼梦》，他究竟在西山什么地方呢？经过分析探寻，“黄叶村”和“谢草地”成为他研究的切入点。

“胡适、顾颉刚和俞平伯开创的‘新红学’，历经风风雨雨，走过百年，其功过得失不乏讨论，亦多有精当之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副秘书长石中琪对新红学百年得失进行了考辨，他认为，评判任何事物，都应该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考较其论，学术现象亦如此。新红学开创之初的考证，无论是其“曹贾互证”方法还是“自叙传”说的内容，都深深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乃至今天我们对《红楼梦》的整体认知。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应必诚在提交的会议论文中，从版本研究出发，在冯其庸先生论庚辰本《石头记》的基础上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索。他表示，关于庚辰本的讨论已有近40年的历史了，并且从未停止过，这说明在红学研究领域，即使是像庚辰本、己卯本这样的具体问题，研究起来也是很不容易的，需要经过反复讨论才能认识清楚。

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詹丹看来，《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是教育界的热点，也引发了红学界的关注。《红楼梦》的特殊结构以及复杂成书过程，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整体特性。把握、探究这种整体性及相关问题，构成《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中的关键。

不只这些研究角度和观点，还有新时期红学40年的经验与成就、中国红楼梦学会40多年来对红学事业发展的作用、《红楼梦》与当代文化建设等等，都成为学术界关注并讨论的焦点。这些学术成果，丰富了红学的内容，推动着红学不断发展。

下一个红学百年再出发

一部《红楼梦》，美了三百年。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经典，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张庆善指出，曹雪芹是一位超越了时代和传统的伟大天才，他以如椽之笔，书写传神之作，它以画卷的形式镌刻了一个民族的心灵史。我们无论是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和家世、研究《红楼梦》版本，还是研究《红楼梦》的思想艺术，其目的都是为了接近这座伟大的文学丰碑，正确地认识这部伟大作品的深厚内涵与文化价值，以便使我们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与时代对话，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满足人们对美好精神生活的追求。

“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钟英华表示，天津与北京近在咫尺，是红学的一片热土，不仅有丰富的红学文化遗存，而且还走出过蜚声中外的红学大家周汝昌，更有源源不断的红学研究队伍。而天津师范大学作为天津红学的重镇，将会从各方面大力支持《红楼梦》研究与红学事业的开展，并积极寻求将四大名著尤其是《红楼梦》进一步推向海外，讲好生动鲜活的中国古典文学故事，让这部伟大的文学经典进一步遍布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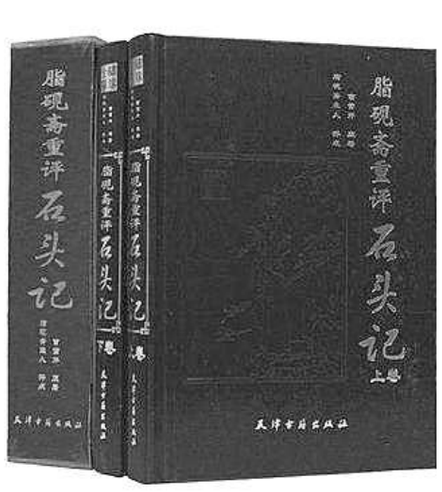
“若以曹雪芹这个历史人物及其作品的研究为线索，系统梳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脉，能够对先秦诸子、司马迁，直至汤显祖、曹雪芹等人的文化、文学思想做认真的整理，将大大有利于锻造中华民族的现实自信心。”胡德平希望以此出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实现《红楼梦》及中国古典文化研究在新时代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202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向世界展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风采之际，回顾百年新红学发展历程，赋予红学新思想与新生命，让《红楼梦》的文字与智慧鲜活地展现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之中，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与创新性发展，正是国家文化自信有力彰显民族精神命脉的坚实根基。

《红楼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是我们民族心灵的深刻投射，已经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具有永恒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韩子勇希望通过本次年会，能继续推进《红楼梦》的研究，加深人们对《红楼梦》的理解，丰富《红楼梦》的时代文化内涵，为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作出贡献。

伟大的曹雪芹，不朽的《红楼梦》。香山，不仅是曹雪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更是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的落脚点，此次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在香山饭店举行，对推动红学事业的发展、引领红学研究的未来走向，具有独特意义。与会代表一致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要为《红楼梦》这部伟大经典的当代传播，为坚定民族文化自信，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而努力奋斗。

▲舞台及银幕上的《红楼梦》



◀《红楼梦》不同时期的版本(部分)

谈文 论艺

论『九个必须』的文化逻辑

唐建军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九个必须”。“九个必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最新成果，富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蕴含严密的传统文化逻辑。

一、文化根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化生产是人民创造力的本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些论述揭示了党的全部生命力的文化根基，体现了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质的民本思想。一是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人民与江山的一体性是人民与历史的一体性的精髓所在。其二，人民是历史前行的原动力。“君者，舟也；庶人，水也。”只有紧紧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历史主观能动性，才能顺应历史发展规律，把执政理想顺利推向前进。其三，人民疾苦指引历史发展方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以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为前提，为儒家政治思想的基调。在第二个百年征程中，只有紧紧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真正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二、文化构造。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且依然活力充溢，除文化基因的传承之外，作为四梁八柱的文化构造保持基本稳定是重要原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造的核心支柱是一元化管理体制。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都奉行一元化集权管理体制。清朝帝制推翻后，300多个政党当中，只有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中国共产党经过历史检验最终取得政权，成功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历史，庄严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重申，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这一论述从思想、政治、制度各个层面体现了一元化管理体制的总体要求，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理论依据。

这一构造的正梁是群体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文化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于欧洲的科学社会主义，脱胎于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后二者或者胎死腹中，或者中途夭折，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社会主义成长的文化土壤。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君臣、父子、夫妻为基本社会关系，以家、乡为基本社会单元，仁、义、礼、智、信为基本社会规范建立起来的，是以人为本的文化，如何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中华哲学的基本问题。《礼记·礼运》说，“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中华文化对生产资料占有方式、财富分配方式、人际关系、人的自由发展等方面的制度设定和未来理想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天然亲近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棵大树能够在中华大地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伟大转变的内在规定，是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宣告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气所在。

三、文化品格。中华文化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优秀品格。这些品格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情感依托、智慧源泉和精神支撑。一是包容意识。《礼记》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论语》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远古开始，中华民族就对各种异质文化采取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态度，从未停止博采众长的脚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进入新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更深融入中华文化肌体。为更好防范改弦易辙风险，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作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现实需要。

二是忧患意识。上忧天地，下忧生计，忧患意识内隐在中华民族的个体、集体潜意识之中，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饱经患难形成的重要生存发展智慧，是中华民族不断战胜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的精神武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在无情地等待着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必然要承担的光荣使命。

三是革新意识。强烈的自省革新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易》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应势而变，与时俱进，是中华文化经受住几千年波谲云诡历史考验的定海神针。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把革新意识推向全新境界——刀刃向内的大无畏的自我革命精神。纵观建党百年历史可以发现，这一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然复杂严峻。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过去先进不等于未来先进，过去经受住风险考验不等于未来也能经受住风险考验。为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永恒命题。

四、文化缺陷。世界上尚未产生一种十全十美、无往不胜的文化。中国封建社会长达2000年的慢速发展，以及近代以来山河破碎、民生涂炭的惨痛经历，都与传统文化的重大缺陷有着密切关系。一是重道轻器。中华传统文化漠视科学技术，缺乏实证科学精神。儒、道、名、法、阴阳诸家皆视科学技术为末道。唯一重视科技的墨家学派在汉朝中断，修齐治平成为君子追求的唯一目标，工艺技术被视为小人所营雕虫小技或奇技淫巧。重道轻器制约了中华民族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为彻底摆脱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实现祖国统一，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实施国防科技建设战略工程，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不二选择。

二是一盘散沙。孙中山曾经感叹，中国四万万人实等于一盘散沙。造成民众一盘散沙的根源，思想上，自认为有德之邦、仁义之国，无人可战而胜之，忽略社会力量的组织动员。经济关系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农经济生产和交换方式造成分散、保守、散漫的文化性格。社会关系上，君权族权夫权父权四权合一，每逢明君缺失，百姓便群龙无首。邓小平说过，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但是自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巩固人民群众思想、情感、行动大统一的良好局面，坚持中华儿女大团结大联合，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依然是中华民族精神重构的重大现实任务。

五、文化理想。中华文化始终把天下放在认知体系加以观照，孜孜以求天下大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天下大同”理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解决现行世界秩序的矛盾危机提供了可行的蓝本，得到国际主流社会积极响应。

“九个必须”深刻总结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从急起来、聚起来、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经验，精确概括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九条规律，深层次回答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领导体制、力量源泉、理论遵循、理想追求、风险应对、短板补救等重大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有“九个必须”护航，我国的复兴伟业将势不可挡。

（作者单位：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